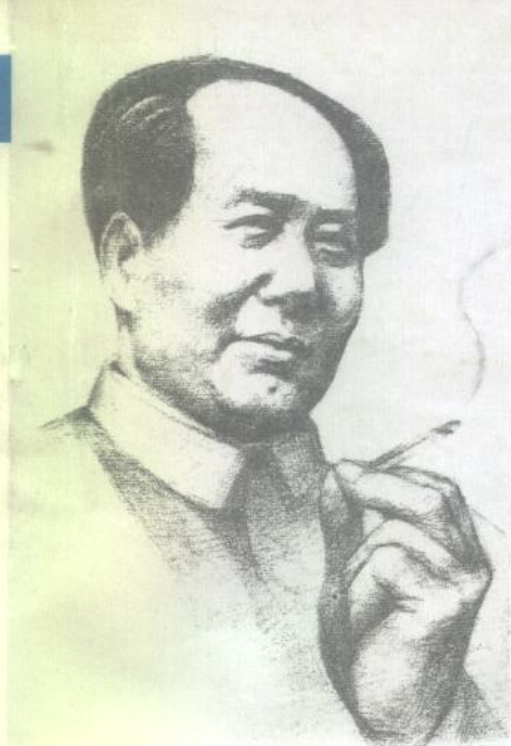




劉思齊 主編

毛澤東

的
統戰交往

東方紅叢書

中國書店

一九四

88107

A752
51

DT64/18

劉思齊 主編

的統戰交往

中國書店

(京)新登字213号

责任编辑：里 功

陈 刚

封面设计：黄晨光

技术编辑：辛丽娜

·东方红丛书·

毛泽东的统战交往

刘思齐 主编

*

中 国 书 店 出 版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98千字

印数：1—30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8-592-4/C·8 定 价：3.70元

我心中的话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结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桌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大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

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尘寰离我而去，不禁怆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还亲自操心，督促我又成了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文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们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

老人家当年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鬓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北京、江西、江苏、湖南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家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著文，与中国书店通力合作出版了这套《东方红》丛书，作为纪念。

刘忍齐

1992年8月30日写在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序

统一战线是我党不同历史时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毛泽东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重要韬略，体现了极高的制敌艺术。

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将劳苦大众团结在救亡图存的大旗之下，同时也将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地主、富农、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民族大义感召下，动员起来共同对敌，抵抗外侮。“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结局。正视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让其回南京领导抗日，作为共产党人，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四·一二大屠杀的血泊，但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与全体国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共同对敌，创造了伟大民族圣战的新局面，这是他把当时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成功实践。这不仅表现了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的襟怀、气概，而根本上是他将这一时期全体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战胜民族之敌放在首位，为中华民族前途斗争，绝非一己之私，换弃一党之利，创造了统战成功的辉煌典范。他对英勇殉

国的国民党抗日将士给予了高度评价，从他给张自忠等将军的悼词、唁电、祭文中都可以体现他与所有志士仁人，都有一副共同跳跃的赤子心肠。

毛泽东与冯玉祥、杨虎成，与解放战争中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傅作义、张治中及解放后回归大陆的卫立煌将军、李宗仁先生的交往过程，都体现了毛泽东始终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解放战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

许多重大的历史决策，都是毛泽东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体现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建设国家的阶级立场。他把高度的革命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如此艺术地运用结合，与中国古代苏秦、张仪的合纵、联横有着本质上的阶级区别。

今天重温历史，统一战线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仍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编 者
壬申 仲冬

目 录

“反对党”占大多数	(1)
广交朋友	(4)
反日爱国统一战线	(10)
民众的大联合	(17)
驱张统一战线	(22)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26)
农民发动起来了	(35)
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41)
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48)
农民是最主要的同盟军	(53)
与绿林好汉交朋友	(59)
做“红色山大王”	(64)
与“开明绅士”	(74)
争取抗战的胜利	(80)
老成谋国 乘虚御风	(87)
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92)
建设大计 亟待商筹	(95)

挚友和诗友	(93)
与“败军之帅”	(109)
永久的纪念	(113)
和平将军	(116)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124)
欢迎程潜将军!	(128)
落叶归根 藉图良晤	(130)
都曾经是他的子民	(139)
“知我者毛泽东也”	(144)

“反对党”占大多数

毛泽东从小就敢于“离经叛道”，特别是反对他父亲的专制和刻薄。他在家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反抗的。父亲送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发家。当毛泽东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他开始给家里记帐。要他学珠算。由于父亲的坚持，毛泽东便在晚上记起帐来。他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他闲着。如果没有帐可记，就叫他去做农活。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性情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平时一文钱也不给他们。

毛泽东的母亲是个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毛泽东的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因为毛泽东的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他们一家为这类事发生过多次争吵。

有一年，韶山冲闹饥荒，穷人们发起了“吃大户”运动。饥饿的人群结队涌进富人家里，打开粮仓，倒出谷子，就地碾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吃那家。家境富裕的毛顺生也受

到了冲击。在粮食异常紧张的时候，他仍然把谷米运到城里去卖。有一次，运出的谷米被穷苦的乡亲扣留了，他非常气愤。后来，家里囤积的粮食又被哥老会抢走了，他更是恼火。但毛泽东却站在穷人一边，对父亲毫不同情。

他们一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他、两个弟弟和他们的母亲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毛泽东的父亲常常无理地责骂他“不孝”和“懒惰”，有时甚至加以体罚。对父亲的专横，母亲赞成用温和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则主张公开反叛。为了辩驳所谓“不孝”的责备，他以经书作武器，对父亲说：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父亲喜欢骂他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他父亲比他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他还宣称：等他长大到他父亲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会比他父亲更勤快得多。

大约在毛泽东13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叫毛泽东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毛泽东，他和父亲当众争吵起来，并且骂了父亲，他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他，他愤而出走。母亲急忙出来讲和，劝他回去。父亲也气势汹汹地追赶。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头。他便跑到池塘边，恫吓父亲说：如果你再迫进一步，我就投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他下跪磕头认错；他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人，可以单跪一腿。结果达成了“协议”，一场风波归

于平息。从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在父亲的压力面前，决不能示弱，只有通过反抗，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是反抗包办婚姻。他13岁的时候，父亲按照古老的陋习，为他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他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起“婚姻”，对此，他父亲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尤其不满意父亲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的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7亩田卖掉。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举动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由家庭及于社会，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又有把柄来批评我。

广交朋友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正是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国内各派军阀不断混战，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异常激烈。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特别关注国家的前途。他主张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并且要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故而必须刻苦攻读。为此，他与朋友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关心和谈论的应该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他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学习，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他认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奇杰何在呢？就在那些满怀救国抱负，而又潜心学习的有志之士当中。但奇杰也终非圣贤，单凭个人的奋斗，断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必须有一大帮志同道合、

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种力量，才能有所作为。因此，毛泽东认为，除亲师而外，应以取友为急，以便作共同、长期之努力。他觉得单是团结校内和少数有志青年还远远不够：团体要结得大，有力量，还必须向校外发展。为此，毛泽东在1915年秋，发出了有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启事共约二、三百字，据他自己的回忆，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有志的青年，特别提出要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启事”标明“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在邮寄“启事”的信封上还写道：“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启事”是由毛泽东自己刻蜡纸油印的，发给长沙各重要学校。长沙当时还是比较闭塞的内地，这种创举自然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因此只得到5、6个人的回信。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暑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5、6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在长郡联合中学（现在长沙市立第二中学）读书的李立三曾回过信，但没有及时深交。当时另一个应征者是罗章龙。他对此回忆说：1915年秋的一天，在我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内容看出，启事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随便写的。看了启事，我觉得，在当年，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按着启事的内容、地址，我写了一封回信。信的大意是：看见启事后非常感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们谈话。我的信从邮局发出后的3、4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他在信里说，发出的启事得到了回音，心里很

高兴。信里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后来我们按约见面，整整谈了3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征友启事”寄到省立女师后，曾引起一场误会。女师的校长对此很注意，以为这是找恋爱对象。他平时不让女生与外界有联系。为此，他亲自跑到一师去了解，找到了陈章甫，又找了一师校长，了解到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女师校长才放心离去。

虽然当时毛泽东征友并不很顺利，但是从此团结了一批学生在他周围。他还与各地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要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奋斗，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

1917年冬，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有关学会发起的原因，毛泽东于1920年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的开头，作了这样的记述：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亲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

同的活动’。于是乃有成立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

新民学会的正式成立是在1918年。这年3月，毛泽东草拟了新民学会章程第一稿，给各发起人传阅，征求意见。4月初，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学会章程，给发起人传阅。4月13日，毛泽东通知有关人，次日开新民学会成立会。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会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市侧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中召开。这天到会的除毛泽东外，有蔡和森、张昆弟、邹彝鼎、陈赞周、何叔衡、肖子升、肖子璋、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谔、叶兆祯、罗璈阶等12人。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学会章程。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章程中还有5条属于生活方面的戒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会议选举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但不久肖子升即去法国，学会实际上一直是毛泽东主持。

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这种思想反映在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写给蔡和

森的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中。蔡和森在8月27日的复信中说，“它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他们大胆地发出这样的雄心：“3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

新民学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1920年7月，旅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尔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的。确定以后，他们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接到信后，非常高兴。于1920年12月1日回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在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宗旨以后，学会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会员们的集会，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研究新思想，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最后逐步发展为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为主。毛泽东同蔡和森在通信中还就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展开了讨论。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一代先驱，他们在青年时代，就毅然肩负起改造中国和世界 的责任，而且是那样无所畏惧，充满信心。

1920年底，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写